

金元诗三百首

黄瑞云 选

石麟 徐柏青 注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746

黄瑞云 选

石麟 徐柏青 注

金元诗三百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金元诗三百首

黄瑞云选 石 麟 徐柏青 注

责任编辑 弦 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鹤壁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2.375 印张 23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3 000 册

ISBN7—5348—0828—6/1·318 定价 7.50 元

前 言

女真族生活在我国东北，历史颇为悠久，千百年来，艰苦经营于白山黑水之间，至五代之际而逐步壮大。公元一一一五年（宋徽宗政和五年），太祖完颜旻建立金国。九年以后，太宗完颜晟继位，于一一二五年灭亡辽国，第二年攻下汴京，覆亡北宋。于是金统治中原，到一二三四年被灭于元，凡有国一百二十年。

女真原来偏处东北一隅，文化落后，立国之初甚至还没有文字。立国以后，迅速汲取了汉族的文化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。他们占领了中原，也占领了中原的文化。或者确切地说，他们征服了中原，中原的文化又征服了他们。

文学史家通常把金源文学分为三个时期。自太祖开国到海陵朝为前期，凡四十五年。从大定明昌到贞祐南渡为中期，凡五十四年。南渡到哀宗亡国直至元好问等遗民去世为后期，约四十余载。由于时代的界划和诗风的差别都非常分明，故本帙也这样划分。

二

金源建国之初,表现出极大的活力,十数年间,灭辽下汴,统一北方,大军到处,所向披靡。然而文化却仍然落后,只戟的铮铮,弓弦的鸣响,却听不到多少歌声。金水河边涌出无数的猛士,却没有一名歌手。清人庄仲方在《金文雅》序中说:“金初无文字也,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。太宗入汴州,取经籍图书,宋宇文虚中、张斛、蔡松年、高士谈辈后先归之,而文字煨兴,然犹借才异代也。”这话准确地反映了金代前期的实际。

金初杰出的诗人基本上都是宋人,但他们的来原各不相同。宇文虚中于宋高宗建炎二年(1128)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国,金太宗爱其才艺,加以官爵,与韩昉等人共掌词命。虚中在金颇受尊宠,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,封河内郡开国公。他的这种处境,与庾信之在北朝很相类似,虽身居高位而心怀故国,加上出仕异族有失臣节的悔恨,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。所以他有許多诗写得非常沉痛。其《在金日作三首》云:“南冠终日囚军府,北雁何时到上林?”“传闻已筑西河馆,自许能肥北海羊。”《己酉书怀》诗云:“生死已从前世定,是非留与后人传。孤臣不为沉湘恨,怅望三韩别有天。”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他的矛盾心情。他未能象庾信那样敷衍到底,终于被金人杀害。吴激的情况和宇文大体相同,也是使金被留的,仕为翰林待制。吴激同家乡旧国有着深厚的关系,他是宋臣吴拭的儿子,王履道的外孙,妇翁是著名书画家米芾。这种渊源使他对

宗国特别牵肠挂肚，一缕剪不断的情丝永远萦绕着故国的河山。他的诗语言明净，善于刻画风光景物来寄寓情怀。吴激还是有名的词人，一阕《人月圆》使所有留金的宋人都为之垂泪。这首小词是金词首屈一指的名作。

高士谈、刘著属于另一种类型。高士谈于宋宣和末任忻州户曹，忻州失陷后入仕于金，为翰林直学士。这种任职实出于无奈，故他在诗里流露出强烈的故国之思。其《题禹庙》诗云：“可怜风雨胼胝苦，后世山河属外人。”对北宋的灭亡有无穷的遗憾。《不眠》诗云：“乱离惊昨梦，漂泊念平生。泪眼依南斗，难忘故国情。”怀恋之情，悲苦之思，充溢于字里行间。高士谈后来和宇文虚中同时被害，不会是偶然的，决不是如传记所云因宇文虚中一言，泄漏了他家藏图书而已。刘著也是由宋入金的，在金仕宦颇不得意。其《至日》诗云：“辞离南国忽经年，一线愁添未死前。心折灵台候云物，眼看东海变桑田。燕巢幕上终非计，雉畜樊中政可怜。安得绝云行九万，却骑鲸背上青天。”金初入据中原，朝廷军政大权都由金国贵族掌握。这些权臣贵胄，对汉族知识分子既歧视又忌恨，所以刘著乃有“燕巢幕上、雉畜樊中”的愤懑。

特殊的历史环境，造成特殊的文学现象。这些金代前期诗坛的代表，他们身登金国的朝廷，而心却长系着淮水那边白云之下的故国。他们都不乏才华，尤多幽思，如此用悵悵愀愀的诗什，写忧悲悒郁的愁肠，使千百年后人们读来仍然哀惋感人。我们敬佩元遗山的器度和识见，元本人是忠于金室的，但他在所编《中州集》里并没有忽略这一大批对金国怀有二心的

诗人,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张斛和蔡松年是第三种类型,尽管心头也有郁闷,但他们是乐事新朝的。张斛仕宋为武陵守,后在金官秘书省著作郎。他有一些描绘江南山水的诗写得不错。但有些学者认为他也和吴激等人一样地思怀宋国则是一种误解。张斛本渔阳人,他诗里的“故山、故国”并不指的南朝。蔡松年是典型的降顺之臣,北宋末随其父蔡靖以燕山府降金。熙宗朝都元帅宗弼(就是《说岳》里被塑造为岳飞对手的金兀术)连年伐宋,蔡松年以行台刑部郎中总军中六部事,因此得到宗弼的引进,并得以和野心勃勃的海陵王完颜亮相善。仕金的宋人大多具有两重人格,而以蔡松年为甚,他和别人的心理也有很大不同。他一方面极力巴结宗弼,同时又感到“自要尘网中,低眉受机械”。完颜亮凶残狂悖,许多大臣都被杀害,蔡松年却能够委迤其间,并得以青云直上。其《淮南道中》诗云:“吾年过五十,所过知前非。颜鬓日苍苍,老境行相追。桔槔听俯仰,随人欲何为!归计勿悠悠,出处吾自知。”蔡松年五十之岁,当完颜亮贞元四年,时为参知政事。他“自知”些什么?又“知非”为何物?明年蔡松年晋尚书右丞,又过两年官至右丞相,是宋人仕金的最高官位,他何尝有过任何的“归计”?《金史》言“海陵谋伐宋,以松年家世仕宋,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”。他于正隆四年去世。金前期的诗人就以这一头引诱南人的带头羊的死去而告一段落。

正隆六年(1161),正当完颜亮进驻瓜洲,试图跨越长江天堑、妄想“立马吴山”的时候,金国后院火起,他的堂兄弟完颜雍即位于辽阳,年号大定,是为世宗。完颜亮旋即为部下所杀,这一代凶横就此告终。金世宗是有金一代持重守成的皇帝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大局,随后又同宋议和,使南北双方得到几十年的和平相峙。世宗在位二十九年,他去世后,皇太孙完颜璟继位,年号明昌,是为章宗。金代没有真正昌明的盛世,只有大定、明昌使北方得到四十多年相对的平静。大定、明昌的诗坛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,和政治上平静相应的是文学上的平庸。诗人不少,但成就平平,其代表人物是蔡珪和党怀英。

金人萧贡曾说:“国初文士,如宇文太学、蔡丞相、吴深州之等,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,然皆宋儒,难以国朝文派论之;故断以正甫为正传之宗,党竹溪次之,礼部闲闲公又次之。”元好问在《中州集》里引了这段话之后说:“天下迄今无异议云。”也就是说这是当时的公论,元好问本人也同意。

蔡珪是蔡松年的儿子。完颜亮天德三年中进士以后不赴选调,却杜门读书。蔡松年作为降顺之臣,他得小心翼翼;而蔡正甫已是丞相公子,自然宽绰多了。他尽可以诗酒自娱,过着“琴里忘忧尽日弹,百忧俱息夜初阑。青灯把卷逢真味,绿酒倾尊破薄寒”(《秋日和张温仲韵》)的生活。蔡珪学问渊博,于金石文字颇有研究,但作为一代正宗的诗人,其诗歌成就却不能

令人首肯。他既无前期诗人的故国之思，又无后期作者的伤时之感，其诗多囿于生活琐事，内容空虚，集中找不出若何有分量的作品。由于蔡氏存诗仅四十六首，是否曾有佳作湮没，我们已无从得知。

党怀英继之而起，其诗学东坡，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，但毕竟还表现出作者本人的秀颖之气，若干作品尚清新可诵。但佳作不多。党怀英年青时与济南辛弃疾师事亳州刘岩老（瞻）。后辛稼轩飞骑南渡，铁马金戈，毅然以恢复中原自任，虽壮志不遂，在文学上却成就了千秋伟业。党怀英安处北方，成就庸庸。其《鹧鸪天》词下片云：“天外事，两悠悠，不应也作可怜愁。开帘放入窥窗月，且尽新凉睡美休。”这种作品与大声镗鞳小声清越的稼轩词相比，真不啻虎啸龙吟之与秋蛩寒蚱。

蔡珪党怀英当日声名籍籍，其秘诀就在于他们迎合朝廷的需要，为统治者铭功颂德。蔡珪《葵花》诗云：“小智区区能卫足，孤忠耿耿只倾心。”准确地描绘了他们自身的形象。他们的主要工力，在于用典雅的文字，为皇帝草拟制诰，其高望宏声亦由此得来。章宗明昌四年，皇叔永蹈伏诛。党怀英为拟诏云：“天下一家，讵可窥于神器；公族三宥，卒莫遁于常刑。非忘本根骨肉之情，盖为宗庙社稷之计。亦由凉德，有失睦亲。乃于间岁之中，连致逆谋之起。恩以义掩，至于重典之亟行；天高听卑，殆非此心之得已。兴言及此，惋叹奚穷！”把一场内部血腥的残杀，说得如此堂皇活脱。论文字技巧，不妨说精妙绝伦；论艺术精神，则可以说毫无价值。他们的才华，就在这种宫廷台阁的应酬文字上作无谓的消耗。人们往往挡不住荣名地位的

诱惑，宁不知正是荣名地位坑害了多少的智士才人！

金代诗歌的发展，有如东去大江的风景：其上游有奇险的峡谷，其下游有浩瀚的洪涛，中间一段却平淡无奇。当然，决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毫无佳作，其中刘瞻、刘迎、周昂、王庭筠等都有诗可录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迎。刘迎的名气远不如蔡、党，然而他实在是大定时期的重要作手，其诗作较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，七言歌行在当时首屈一指。

四

金代后期，漠北的蒙古族勃然兴起。自卫绍王大安三年（1211）成吉思汗首次犯边，从此成为金国的威胁。西北河山，相继沦陷。金宣宗顶不住蒙古的压力，于贞祐二年（1214）迁都于汴，史称“贞祐南渡”，金王朝从此走向衰微。宣宗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，南开宋衅，西结夏兵，使自己腹背受敌。二十年之后，即到金哀宗朝，终为蒙宋联军所灭。

金后期诗人面临的现实，和以往完全不同。这时期的诗人有两个类型，我们得分别加以叙述。尽管两者并非对立的派别，但诗风确有很大的差异。

一个类型是大定明昌延续下来的诗人，以赵秉文为中心，其中著名的角色有杨云翼、王若虚、李纯甫等人。

赵秉文是金代的重要诗人。他历仕五朝，官至六卿，自大安三年党怀英去世后盟主文坛近四十年。金代后期许多诗人，包括元好问在内都出自他的门下。赵秉文的创作实绩亦有可观。元好问闲闲公墓铭里说他“七言长诗气势纵横，不拘一律。

律诗精壮，小诗精绝，多以近体为之。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，真淳古淡似陶渊明。以它文较之，或不逮也。”这当然不无夸誉之词，但他毕竟写出了不少佳作。但赵秉文的创作走的仍然是蔡珪、党怀英的路子。他生活的后期，金源社会已满目疮痍，外有强敌压境，内部政治腐败，国家已岌岌可危，赵秉文却仍在他的闲闲堂里逍遥自在。“所贵心无事，心安身自安。低头拾红叶，仰面看青山。朝听新泉响，暮送马飞还。清晨了人事，过午掩柴关。高非出天外，低不堕尘寰。花落鸟声寂，我处动静间。”（《闲闲堂》）天下已民不聊生，诗人却如此闲闲，实在中庸得可以！赵秉文存诗近六百首，以留连光景之作为多。其中拟和陶渊明的作品有近四十首，和韦应物的也不少。在兵荒马乱中把陶渊明拉过来，扯过去，陶渊明地下有灵肯定非常狼狈。这样的作品谈不上什么真陶渊明的真淳，而只有假陶渊明的麻木。和赵秉文“代掌文柄”的杨云翼，其创作成就远不如赵。声名与杨云翼亦差可比拟的王若虚，其理论建树过于创作成就。

这些诗人中有一个较为独特的就是李纯甫。金源诗尚平易，李屏山却追求险怪。他的七言古诗较有特色。刘祁《归潜志》云：“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，每曰当别转一路，勿随人脚跟。故多喜奇怪。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，诗不出卢仝李贺。晚甚爱杨万里，曰活泼刺底，人难及也。”追求自成一家并不错，但李屏山往往勉强装作，就未免有失自然。屏山诗的风格和赵秉文不同，回避现实的态度却不相上下。其《偶得》一诗云：“包裹青衫已十年，聪明更觉不如前。簿书丛里先抽手，

鼓角场中少息肩。瓿底剩储元亮粟，叉头高挂老坡钱。会须着我屏山下，了却平生不问天。”这些字里行里固不无牢骚，但毕竟是非常消极的。诗最足以说明李屏山的人生态度，也表现了与之同类型作者的颓靡诗风和逃避现实的麻木状态。

另一类诗人和赵秉文等人大不相同。他们生活的时间虽和前一类人交错，但年辈大多较赵秉文、杨云翼为晚，地位也较赵、杨为低。“干戈扰扰遍中州”，他们已没有一个可以“闲闲”的角落。他们亲历乱离的痛苦，目睹山河的破碎，命运迫使他们在颠沛流连的道途上唱起时代的哀歌，倾诉人民的苦难。如赵元的《修城去》，记录了劳动人民被迫修补城垣沥尽膏脂的苦况。由于统治者的腐朽，付去的全是无益的辛劳。诗人由此发出了“君不见得一李勣贤长城，莫道人间无李勣”的慨叹。冯延登的《鄜城道中》描绘了遭到破坏的村落的荒凉。秦略的《谷靡靡》刻画了农民运送官粮的艰辛。王元粹《西山避乱三首》以亲身经历述说出流亡的痛苦。而宋九嘉的《途中书事》、雷琯的《商歌十章》更绘出了人间凄惨的流民图。他如麻九畴、辛愿、李俊民、李汾、麻革等，都以各具风格的篇章，描绘了残破中原的图景，写出了乱离人们的心曲。在这一大群作者中，成就最为辉煌，贡献最为卓越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金诗的殿军大诗人遗山先生元好问。

五

元好问在编完《中州集》后题的绝句中说：“邺下曹刘气尽豪，江东诸谢韵尤高。若从华实评诗品，未便吴侬得锦袍。”他

的结论显然带有宗国的感情，金国诗歌虽也可观，但总的成就是不如南宋的。在元好问之前，没有一个诗人可以同南方的范成大、杨万里、陆放翁一较高低。北国的词人较之辛弃疾更是莫能望其项背。而当元好问步入诗坛之日，南国的巨星都已陨落。只有这时候，这一领“锦袍”才可以夺回北国，元好问受之而无愧。

元好问，字裕之，太原秀容人，他在年青的时候即已崭露头角，以《箕山》《琴台》等诗得到赵秉文的赏识而名动京师；当时他的诗即已有自己的风格，比较地关心民瘼，注目苍生。好问二十五岁那年，贞祐南渡，国家已只剩下半壁河山，兵连祸结，国脉如缕。二十年间，元好问或流亡道路，或僻处乡间，其后在哀宗朝短暂地做过三任县令，再在朝担任过左司都事的小官。这种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了解满目疮痍的社会。他在《八月并州雁》《寄赵宜之》《虎害》《驱猪行》《宛丘叹》等诗中描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，揭露了统治者政治的黑暗。“大城满豺虎，小城空雀鼠。可怜河朔州，人掘草根官煮弩。”这就是当时北国中原的现实。好问四十五岁之时，蔡州陷落，金国覆亡，诗人从此成为亡国的遗民。在这期间，元好问写了大量的作品，翔实地记录了金亡前后的悲惨历程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无限的悲愤，成为金元易代之际血泪斑斑的诗史。《岐阳三首》、《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》、《俳体雪香亭杂咏》十五首、《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》、《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》、《续小娘歌十首》，是这时期的代表作。“岐阳西望无来信，陇水东流闻哭声。”“精卫有冤填瀚海，包胥无泪哭秦庭。”“秋

风不用吹华发，沧海横流要此身！”这样的诗句，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心的颤动和血的沸腾。赵瓯北诗云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写到沧桑句便工。”灾难造就了诗人，蒙古人的长枪大戟摧毁了完颜王朝的城阙，却促成了诗人元好问竖起自己不朽的丰碑。

元好问的诗诸体兼备，五言古诗，七言绝句并有许多名作，七言律诗尤所擅长，其反映金亡前后的诗篇大多是七律。苏雪林《辽金元文学》谓“唐以来，律诗之可歌可泣者，杜甫数十联外，绝无嗣响，好问则往往有之。”这虽然说得过分，然亦可知遗山七律成就之高。前人多注意到，元好问生长河朔，挟幽并豪侠之气，又值金源亡国，宗社丘墟，故发而为诗，慷慨悲歌，又不求工而自工者。然此亦并非全面，好问工力极深，于前人诗艺，兼收并蓄，故其诗歌风格，豪雄俊爽与沉郁顿挫同时并具，馥郁纤秣同豪雄悲壮兼而有之，卓然成一代大家。

元好问的诗歌评论亦成就斐然。《论诗三十首》是继杜甫论诗绝句之后的大型组诗。其诗论崇尚刚健自然，反对绮靡造作。好问作此组诗之时，年仅二十八岁，然其识见深微独到，影响极其深远。后代仿造之作，规模或有过之，然对历代诗人评判之精审，于诗歌艺术持论之坚实，似尚无人可比。

六

金在政治上与南宋对抗，而诗歌创作则南北争辉。有金一代诗艺，实紧承北宋而来。北宋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山谷都有影响，而以东坡为最。如果从字面上看，在金诗中出现最多的古

代诗人，一是陶渊明，二是苏东坡。然渊明的出现，主要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诗人感到无聊，或者是身居下位的诗人碰到矛盾，需要在陶渊明那里去寻找安慰，并不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实质。而东坡则完全两样，苏东坡清雄明畅的诗风成为金源诗人创作的楷模。试看《全金诗》中“次东坡韵”、“和东坡诗”、“集东坡句”所在多有；而仿效东坡句法，摘取东坡词汇，更随处可见。从金代初期历大定明昌直至金末，苏东坡的影子到处可以碰到。清代评论家认为元好问也直承东坡。翁方纲《读元遗山诗》甚至说：“遗山接眉山，浩乎波涛翻。”当然，现实的教育比任何前人的影响都大，金元易代之际，地覆天翻，风衰俗怨，于此麻革，李汾、元好问等的歌唱，沉郁苍凉，梗概多气，扫净前人的踪迹，完全是他们“自己的”作品了。北宋大家黄山谷的影响在金代当然也有，但在创作中不那么突出，而且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。特别是王若虚出来，打起苏诗的旗号，对黄山谷和江西诗大加挹伐，就更没有他们的地位了。

自西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直至契丹西夏，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，往往使南方望而生畏。提到诗歌创造，他们就只能怅望南云，莫可奈何了。所以南方的文士，如王褒、庾信，一到北方，便成为至宝。唯独金源，诗歌的造诣并不少弱，乃至赅赅乎可以与南宋抗衡，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王朝都无法比拟的。

当然，我们要感谢元好问。好问于金亡之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辛勤劳动，苦心孤诣，收集有金一代的文献，编成《壬辰杂编》和《中州集》两部大著。《壬辰杂编》虽已亡佚，但它为元代

撰写《金史》提供了材料。而《中州集》则保存了金代的诗歌。尽管由于“兵火散亡，计所存者，才什一耳”，但毕竟使我们可以窥见金诗的概貌。清代郭元钊《中州集》的基础上，加上王寂、赵秉文、王若虚、李俊民、元好问、段氏兄弟等的集子和《河汾诸老诗集》中的作品，收辑佚编，补缀遗漏，编成《全金诗》，使我们现在能看到金诗三百五十八家五千五百四十四首。如果没有元好问的努力，那么金亡之前的许多诗篇都会湮没，那些诗人就只能在九泉之下长恨绵绵。单是这个方面，我们也应该充分评价元好问的功绩。

七

历史进入元蒙，又走上了一段崎岖的道路。蒙古族人生于漠北，逐水草而居，以畜牧为生，好狩猎，善骑射，是一个极其彪悍的民族。十三世纪初，蒙古狂飙突起，在其杰出的统帅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率领下，统一了蒙古各部，随后进行了旷古空前前的掠夺战争，征服了许多国家，建立起地跨欧亚硕大无朋的大蒙古国。几十年之后，铁木真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，灭亡南宋，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华大地的王朝。

研究一下元王朝的历史非常有趣。这个王朝统治者的英华才气，似乎在征伐战争中消耗殆尽，到统一中国之后即开始萎靡。元世祖建元之后还做了二十四年皇帝，一直在征讨和镇压战争中度过。他的孙子成宗铁木耳又干了十三年，才勉强安定下来。两者合计去了三十七年，这是元朝的前期。元代最后一个皇帝惠宗（顺帝）妥欢铁木耳一抢上宝座，就在全国人民

的起义浪潮中颠簸，但他也混了三十六年。元朝统共九十八年，前后两期相加就去了七十三年；中间二十五年，戴过皇帝帽子的竟多达八人，可以想见其何等混乱。元代诗歌就是在这样戏剧性的历史背景下挣扎过来的。

要为元代诗歌分期却较为困难。元王朝如此短命，元代诗人却大多长寿。录入本帙有生卒可考的诗人，其平均寿命竟超过了七十岁，这是任何一个王朝也未曾有过的奇迹。出生于元世祖时代的诗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活到了惠宗时代。遗民诗人，顾名思义，应该生活在王朝的前期。潘音是典型的遗民诗人，但他却“遗”过了八十多年，几乎要把整个元朝“遗”了过去。进入了明代的诗人无疑应生活在元代后期。周霆震入明以后还活了十年，但他竟出生于元世祖时代。潘、周并世长达六十四年。元代诗人这种交搭现象极为普遍。

但我们仍可以找到简便的办法，将元诗分为前、中、后三个时期。我把一二七〇年之前（元世祖一二七一年建元，所以基本上是建元以前）出生的人属之前期。前期诗坛以遗民诗人为主，其中戴表元、黄庚、刘因、宋元都是遗民。赵孟頫虽由遗民走向了官宦，他的作品中仍不无故国之思。一二七〇到一二八〇这十年出生的人属之中期，其中包括虞、杨、范、揭所谓“元代四大家”，以及张养浩、柳贯、黄潜和萨都刺。他们都出生在元朝建国的最初几年，好象相约结伴而来似的。他们大都供职于朝廷，是典型的元代诗人，其主要活动年代正在元代中期。一二八〇年以后出生的诗人属之后期，以平民和低级官员的诗人为主体，王冕和杨维桢是其中主要的角色。——三个